

0411

总第二十一期——第三十五期

平陆文史资料

汇编

政协平陆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平陆文史资料汇编

第 21 ~ 35 期

总编审

陈平果

编 审

王楚京

主 编

富平宁

平陆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二〇〇〇年六月

目 录

- 特 稿 三晋名宿著名藏书家张贯三先生(李文林)
- 第二十一期 李先念主席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苦守中条山的赵将军(金在熔) 赵善卿同志传略(赵两喜) 黄埔军校平陆籍学员名录(郭建星)
- 第二十二期 “六六”战役纪实(姚杰)
- 第二十三期 平陆县教育今昔发展概况
教育人物志:杜若拙 乔寿山 董俊德 解守义 杨子才 张隗初 杨润荣
- 第二十四期 我在西南军大期间(牛藩) 平陆县煤田基本情况分析及煤炭工业发展简史(张俊平) 平陆县太阳渡码头工人运动史(牛致民) 赵万忠同志生平(王连奎) 杨尚林先生生平简介(王连奎)
- 第二十五期 支援陈赓大军渡河南征(郭子健) 张端生平简介(郭建星) 平陆前庄商代遗址发现文物(卫斯) 飞渡黄河夜夺敌船(郭峰 杨光斗) 张店锣鼓(马加杰)
- 第二十六期 难忘的平陆(李子舍) 平陆师范学校
- 第二十七期 四·一七战役(姚杰) 上庄突围前后(杨光斗) 王安(郭建星) 民食的习俗(李泰生)
- 第二十八期 血染郭原(余勉) 杜马阻击战(胥永楨) 回忆我县第一所女子高小(李英华) 安平干部子弟完小(李复东 赵月德)
- 第二十九期 三门峡库区建设移民和县城迁建工作(解增福) 回忆平陆“61事件”(郭建星) 我被打入一贯道情况的回忆(赵泰生 赵月德) 程宽(富平宁) 平陆首府考(张明堂)
- 第三十期 骑“龙”渡黄河(朱英) 以劣胜优的庙底伏击战 东堡脱险(丁振英) 血债累累的还乡团(丁振英) 毛铎简介 毛铎轶事(转载) 日寇暴行录(富平宁)
- 第三十一期 爱国心诚 德艺双馨(谭康明) 琐忆荆梅丞先生(张希艾) 伯乐识马(张明堂) 卫光华(富平宁) 平陆县镇压反革命运动(党史办供稿) 平陆县古虞城遗址简介(博物馆供稿)
- 第三十二期 前庄商代遗址发现与考察(卫斯) 百里奚(张明堂) 员行三(富平宁) 忆毛山知青(王楚京)
- 第三十三期 砥砺人师的事业——教师进修校发展概况(王斗娃) 平陆新石器时代遗址复查试掘简报(蒋忠义 阳吉昌)
- 第三十四期 黄河遇险始末(谭明西 富平宁) 虞芮檀道庙会(王楚京) 平陆老县城忆旧(王町湘)
- 第三十五期 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 史念海(王安深) 回忆平陆中学搬迁经过(王振华 赵月德 王连奎 富平宁)

封面题词 姚十保

封底照片 平陆古八景之古三门峡

装订数 400册

工本费 22.80元

平陆文史资料

特稿

平陆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2000年6月10日



张贯三先生

三晋名宿张贯三先生是近代山西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和藏书家。小时候，我几次得瞻老人丰采，并见过他那富甲三晋的藏书。因先生是先父最尊崇的恩师，所以，我幼时的心目中就矗立起他老人家的高大形象。年长后，闻先生生平治学事渐多，又稍诵其诗文，知先父之心仰先生盖有自也。光阴荏苒，一晃过去了几十年，连先生的弟子也多已作古，而撰忆先生的文章却甚聊聊，有慨于此，我拟就所闻而述之，以了多年的夙愿，自知矮人观场，难述先生于万一，而又不甘废笔空叹，只好勉为所难，成此拙篇，其疏误一俟知先生者正之。

青少年情形

先生名籍，字贯三，号闻三、闲田，1872年（清同治11年），出生在山西省平陆县西马村（今洪池乡刘湛村）一个贫寒的农家。因家中仅有二

亩田，不足以糊口，其父辈除务农外，还赶牲口当脚夫，或在黄河边的太阳渡作摆渡，维持着艰难的生计。

先生的祖父丹山公业儒未成，深自遗憾，而家族之旁系中，先后出过几个拔贡、举人等有科举功名的人，每令他叹羡不已。先生发蒙后，祖父就把读书成名的一腔热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启诱劝勉，费尽心思，爱孙及师，礼遇有加。为了不中断学习，即使在农忙或年节放假时，丹山公也要为小孙另择一僻地静屋，督其温习功课，且亲为析薪燃火，虽自烟薰火灼而不恤也。小孙孙的朗朗书声予老人以无限欣慰，常高兴地说：“只要娃子好好念书，我就是喝凉水也心甘情愿。”先生曾说：“某六岁读书，十四岁以后始学文章，十二岁前诵读之基础已立，日读四五十行也。”（见先父李良和1928-1932年山西大学课堂笔记。以下引文凡不注明者亦如此出）

先生年十一，从师他乡。因家寒

三晋名宿

著名藏书家

张贯三先生

*李文林

故，其父凡萼公每要儿子辍学务农，而丹山公坚决不允，父子俩常因此而口角。先生十五岁那年，在一次锄田时，不慎锄掉几株禾苗，招致父亲的责打，误伤其足。一因生了父亲的气，二因难旋于二亲之命，遂离家出走，到了邻村一富人家当佣工。此时他学业已有相当基础，故又兼作东家孩子的小先生，导其功课。已经养成好学习惯的先生，自然不忘工余苦学，三年后，居然考上了秀才，且高中案首（秀才第一名），一时传为佳话。

中秀才之后，先生受本县孙某、刘某两家教童馆，许以月银20两。先生刚到馆，其父便去讨钱，东家为之预支银10两。以后，先生之月银全部交由祖父和父亲使用，他自己另有代人改作文章之微薄收入，仅以此自给也。薛笃弼^①当时即在该馆受先生启蒙。

20岁以后，先生又肄业解梁、河东、晋阳各书院。28岁，中本省第19名举人。1899年至1900年，先生被取调太原令德书院深造，亲炙屠梅村等名士，学业更进，胸次益阔。

隰州办学

1901年，先生会试未中，遂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毕业后，获法政优等文凭，授职长芦大使。嗣因厌恶官场习气，不肯俯仰于人，历时不久，即返晋西吕梁山区的隰州，主讲紫川书院，欲施抱负于教育事业。时在1903年或1904年。

受过京师大学堂法政教育的先生，自然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到隰州后，他慕维新之政，深感旧式书院已远落后于时代，亟需代之以新式学校，培养新型人才，决意改书院为学堂，却遭到守旧州官的反对。先生力坚不屈，讼之于巡抚，幸获支持，知州遵撤。然新知州复阻其革新事，不得不复为上诉。结果，没坐多久的新知州又被撤离。直至第三任州官，始

不阻其事，终将紫川书院改为隰州学堂。于此可见先生破旧立新之顽强精神。

刚办起来的学堂，除聘一青年教师担任体育课外，其余文史数理等课皆先生一人任之，先生实集校长、教员、打铃工于一身，海劳忘倦，辛苦备尝。1905年，学堂又扩而为两级，并收女子入学，使新风更加吹被偏僻闭塞之吕梁山区。

因先生办学有方，声闻附近各州县，故不乏远道而来求学者。关于先生此间办学情形，《山西人物志资料》（山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志·人物志》编写组编）中的冯纶、冯济、王平诸传记中亦有点滴反映，如“时平陆张贯三应聘到隰，主紫川书院讲学，设教严肃，乡子弟多被教泽”（《冯纶传》）云云；如“平陆举人张贯三（贯三）应聘至隰掌教，山西学子多萃其门”（《冯济传》）云云；如“1905年，书院改建学堂后，平陆宿儒张贯三（贯三）……实行新法教习”（《王平传》）云云，于此可窥先生办学之概略。越三年，晋南之解州欲以月银360两之高薪聘先生任教，隰州地方苦留，且以如解州之月薪许先生，先生难以果行，在隰州又教了三年。

先生教绩卓著，声达省垣。1907年（或1908年），山西大学堂聘先生。隰州再难挽留，而学生与家长深恋先生，一些家长恳于先生曰：“先生既不可留，我等子女亦托付先生矣，生死唯先生命之。”可以想见，当先生告别隰州时，该是一场何等留连动人的情景。

先生答应了家长们的恳求，领着冯纶^②等30个学生（其中男生24人，女生6人）到了太原，一同住在上官巷。每晚，先生还要为隰州学生讲解功课，常常半夜始得就寝。在先生指导下，隰州学生陆续考入大学、中学、测量学校、陆军小学等学校。从紫川书院到两级学堂，直至山西大学，冯纶始终受教于先生，为先生之高足。

执教山西大学

1910年,先生因有不满清廷之言论,为巡抚恩铭所疑,不得不暂离山大,回平陆老家躲避。翌年,只身走开封,在河南高等学堂(河南大学前身)任史地教员。

1913年,先生重返山大,任预科一部(文科)学长。1918年8月,继郭象升任文科学长。1925年,山大各学科均改为学院,先生任文学院(含国文学系和英文学系)院长,至1937年年老辞职。先生任文科学长时,文一班(1916年招生)尚未毕业,故民国以来到“七七”事变25年间,山大文科学生皆得先生教诲。

就其学养来说,先生首先是造诣精湛的经学家。孔孟之后,先生所服膺者,于宋则程、朱,于明则胡居仁、薛暄,于清则吕留良、陆清献。然先生的学问又不独在于经学,他真正是那博览群书的人,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人。另外,作为藏书家的他,于版本目录之学尤具擅长,这就更不待言了。唯此之故,才有执山大文学院牛耳之资。

先生爱惜人才,尊重人才。作为学长或院长,他对那些有真才实学又脚踏实地教书育人的教员,尊爱如兄长。1930年,是先生的一番恳切动容之辞最终感动说服了李亮工先生,使即将起程的李先生弃聘湖北大学,继续留任山大,为文学院挽留了这位文字音韵学名家,有惠后来学子甚多。先生是一个讲求实际,屏弃浮华的人,他所要求于教员者,除了才学之外,就是认真教书,不误人子弟。一些虽有学问,但疏散成性,不勤于教学的教员,免不了要受到他的督责,有时兴之所来,戏赠以诗而微讽之,如“……年高春梦短,妻小起身迟……出门忙赴校,日已八砖移”即此类也。据说,有一位声望颇高的某教员,自恃才高,始终懒于上课,却又想拿高薪,甚为先生不满,为此搞得关系紧张。由于先生不予迁就,某呆了不久就自行离去了。总之,先生在办学上是严肃认真的,其作风是光明正大的,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不管是校长还是哪一层领导做的决定,只要他有异议,就要争辩,决不盲

从。

先生虽为院长,但他从没有把主要精力泡在繁忙琐屑的院务中,他始终以一个潜心于登堂讲学的教员自任。先生以其渊达之学教书育人,无论经学,无论诗古文辞,每讲授,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呼之即出。每释疑解难,必抉精择髓,穷源究委,令人心折而后已。他讲授的《四库书目提要》,大开学生眼界,尤为人赞道。向来讲学者各有其学派之特色,先生的特色一是注重精神,不泥于字句之间;一是不拘守一家之言。其时执教者多是师承有自的硕儒名流,各以所受师法授教,故不免好丹非素,有门户之见;先生则不沾沾于一家之言,能够决破罗网,博采众长,阐幽而发微。在教学方法上,他重视启发诱导,认为善教者不可一下说尽精微,必予学生留思考的余地。

先生黎明即起,展卷读书,学而不厌,决不坐吃老本,自谓“吾日日有新得之学问,是以无不爽快时也。”他勤于笔耕,每有新作之诗文辞赋以饷学生,唯先生这等榜样,才能诱发学生赋诗作文的兴味。他认为,学生倘能经常以诗文就正于老师,才能相知而增进情谊,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联络,师生之间应该主要通过这种方式联络感情,而不是无聊的应酬客套。

辛亥以后,名为共和,实犹专制。1928年后,国民党蒋介石表面上统一了全国,但不过是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兵连祸结依然,外患侵逼益甚,先生心焉忧之,心焉痛之,赋诗曰:“大好河山付少年,潢池兵弄剧堪怜。党人社会危今古,几戏国家痛万千。白日有谁钦尧舜?青天无复戴尧天!一波未平一波起,依旧旋坤又转乾。”这是1929年先生写的《有感示诸生十首》之第一首。十首诗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鞭挞了争战无已的新军阀和朝秦暮楚的官僚政客,对“剥尽枯骨又尽脂”的国民表达了无限的同情,而“净扫尘烟完铁汉”,“后来小子尚兢兢”等诗句又是对学生们的希望和勉励。象这类讥刺时政的诗文,先生写了许多,他这样示范于学生,其用心又岂止在

于写作的方法和技巧!

作为爱国教育家的先生,多么希望自己所培养的学生个个成为安邦治国的人材,但是,现实却难如人意,不少的学生毕业后相继进入政界、军界,成了跋扈军人或无耻政客帮凶,这是最令先生痛心的事情。

1931年,先生作有如下之对联:

苦口具婆心怕诸君异日出身作个民贼作个国贼

德前复德后恨自己历年造士几辈官奴几辈军奴

此联显示诸学生的。在此,道出了先生对那些毕业后变作“官奴”、“军奴”的学生的失望之情。虽然如此,他还是谆谆教导那些正在受教的学生们,要他们“沉潜积学,勿急急图小位,为人奴隶。”他说:“非官不可做,乃世俗之贪污之官不可做也。”又说:“供职国事,勿为奴隶,勿为盗贼,斯得矣。”但是,在那淤泥之世,有多少人能洁身不污呢?1932年,先生对临将毕业的学生们说:“诸生毕业后,最好先从事教育事业,当教员可耳。……今国家危乱万分,惟学界事较可为耳。”先生之教诲学生,真可谓“苦口具婆心”了。

出身于举人而又嗜爱经学的先生,其思想自然免不了有守旧的一面。如有人说,1919年胡适到太原作关于白话文的报告时,先生不准学生去听讲。这是极有可能的。我们绝不替先生此为作辩护,但也应知道点历史背景的另一面。当时,一些留学归来者一味崇洋媚外,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这是先生最为反感的。在先生看来,这些“欧雨美风”形形色色新思潮是引发社会祸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此,他对那位崇尚实用主义的胡博士不感兴趣也就不难理解了。

海藏庐纪略

作为一个藏书家,先生不独名满山西,而且饮誉华北地区。

先生的居所名曰海藏庐。先生《海藏庐记》云:“海藏庐者,藏我国图书之庐也。庐谁主?图书主之也。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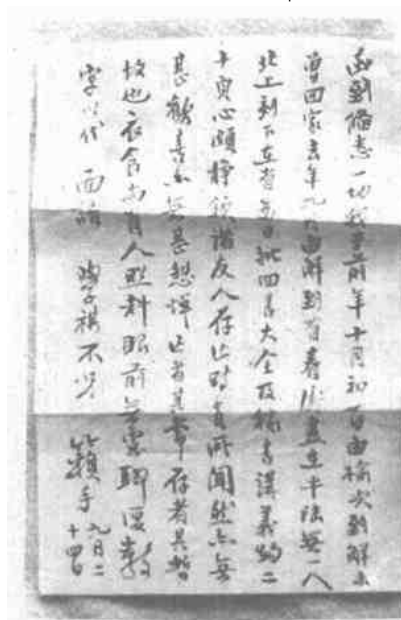
云图书主之,则凡能维持、增进图书之藏者得居此庐,无亲疏别,无贵贱别,无男女别……”有鉴于古今藏书家的教训,先生一改其产权继承惯例,作了如上规定,此亦见其民主革新精神也。

海藏庐在太原海子边三圣庵6号,5号则是与先生齐名的郭象升的住宅。两位三晋名士比邻而居,如双星辉映,曾引来过无数文人雅士和达官显要,也是昔日三圣庵的一大风光。先生之街门坐东面西,入其门,“海藏庐”三个楷书大字耀然照壁之上。院分两进,里外院各有正房三间,南房三间。里院有两层之东楼房五间,其中东南、东北隅系配楼,各为一间。

1946年,我初顾海藏庐时,由先生之外孙常士功兄导引,登楼入室,一睹珍藏。只记得楼上楼下书架林立,满眼牙签锦轴,鳞比星章,喻之书巢、书仓、书窟、书城,不过也。另外,还有许多陶器、瓷器、钟鼎、金石和说不出名堂的古董,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令我惊奇,使我感到神秘。于今思之,当年先父教我与此等气氛相接,似亦有孟(武公)母之意耶?

先生之藏书,以集部为最多,次为经、史、子部。1929年,先生曾说:“吾共收藏诗文集几及五千种”,而据《山西人物志资料·张簪传》(以下简称《张簪传》)说,先生“1924年编成的《海藏庐集部目录》光集部约达十万册。”究竟其经史子集各类书籍最多藏到多少种多少册,有俟后考。

先生所藏史部书籍以地方志最多。《张簪传》谓:“全省各府州县志,除平鲁、方山两县外,他皆藏有。”我考之先父笔记,综合先生之言,盖知截至1930年,山西无县志者为右玉、平鲁、平顺三县,神池、左云二县已有志稿(左云志草稿共四本。神池志稿由谷如墉所修,由谷仲阳收藏),但尚未刊印行世。《永和县志》在永和县仅有馆藏的一部,私家藏的一部,先生于北京书局买到该县志的草本(计四本)。其他各县(包括府、州),凡刊印行世过的志书,先生都有收藏,所以先生有言:“山西县志某收藏已全。”此外,先生还说过“中



张贯三先生致学生
李良和书(写于1944年)

国省志某已收全”的话。在省志中,先生自然尤重山西省志的收藏。山西省志明清两代共有七个版本,先生不仅藏有最后重修的光绪版《山西通志》,而且藏有最早的明弘治版《山西通志》(共十六卷)的影抄本^①。弘治版《山西通志》已极为罕见,无法购求,

先生不惜重金托人就北京图书馆藏本影抄之。以上所写,应该是先生所藏地方志的大致情况。

购求书籍,是最美事,最乐事,也是最难事。有些书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如明七子(王世贞、李攀龙等七人)集,先生花了二十年时间方才买全。根据他的体验,“欲精而专,汉宋不能兼营也;循序以进,则甲乙不能躐等也……执此意以藏书,则所藏之书亦寥寥无几。”(《〈海藏庐书目初编〉序》)。以下简称《序》)所以,先生购书,首重实用,但也不乏珍本善本。就宋版书而言,《张籍传》仅记有《孝经》、《论语》两部,常士功兄说,宋版四书皆备,此外,还有宋版《资治通鉴》和《岳武穆集》,这就弥足珍贵了。按先父所记,先生所藏宋版《中庸》装裱成2册,共71页,买价255元,裱糊装订用洋百余元(先生均以银元论值。下同)。宋版书之外,还有未刻明印之《通鉴纪事本末》,凡96册,买价100余元;著名校刊家何义门朱批真迹《临川文集》,买价300余元;丘葵《周礼补亡》一部,买价500元(按其买

价可能是元版书)。1928年先生说过:“吾家藏有明版诗文120部”。1935年,先父往观先生藏书后,有“共藏明版书52箱”的记录,此52箱是否已超过了那120部,亦未可知。先生说过,明版书以嘉靖以前之版本为佳,嘉靖以后,文士浅鲜,好改古文,其版本不可贵。由此,似亦可以窥见先生所藏明版书的一些情况。

出身于农家的先生,于衣食极易满足,于书籍却欲无止境,几十年修脯所得全充实了海藏庐的架柜橱箱。解城、开封、太原的书肆中不知留下了他的多少足迹,许多书店的老板、经理成了他的朋友。壮年而后,学愈进,嗜书之念愈广而愈奢,区区太原已难满足他的奢望,还经常邮购于北平、上海,“书来钱往,岁无虚月”(1930年先生为北平直隶书局总经理宋惺吾先生所作的《宋惺吾先生六十寿序》。下同)不仅如此,他还每乘假期之暇,亲赴北平选购,“年一至,二年一至,三年一至……每一至也,购书之资常在千元,去年更及万元。”还在1914年,在郭象升所作《太原市上购书歌》中,有赞先生曰:“吾党购书谁最豪?贯三濡首真老饕,挥金已致十万卷,阅市尚复奔走劳。”到1924年,先生之书,“等身之架已愈半百”,那么,十多年而后,到抗战前,先生之藏书又该是多少架了呢?先生肄业令德书院时,见到屠梅村山长之藏书,惊羨不已,由此而立下了藏书之志:“丈夫终身穷困则已,少有所得,购书其首务也……兼之天赋以迂拙之性,不便于宦途,人拒以声气之求,不宜于新界,与世无与,正与书有缘也”(《序》),终至成为拥书万卷,不啻南面百城的藏书家。他写的《负债买书戏示诸同学》一诗,活现了他这位藏书家的豪迈气概和达观而自得的心性:“轻轻一掷又千元,措大哪来如许钱?只为嗜书成痼疾,不妨积债累明年。人情大抵扰身后,我意惟知快眼前。杜库已盈曹仓满,何殊十万在腰缠!”

我国的藏书家,无不又是历史文物的爱好者,收藏者,先生亦然。故海藏庐不独藏有万卷图书,且藏有数以万计的珍贵碑帖字画金石陶瓷器等文物。

先生所收藏的刀布等古钱币难以计数,所藏甲骨(文)也装了几箱。宋哥窑、弟窑、明景泰兰等瓷器以及陶器、玉器、古玩、钟鼎等金石文物亦相当可观,至于碑帖和墓志拓本拓页更是成捆成摞。先生(1932年)说过:“余近收藏墓志凡七百余种。他日如足一千种,便撰一简明目录,定名曰‘墓丛’。”不知后来作成《墓丛》否。古今名人字画更是先生的一大爱好,其中对联的收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先生藏有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手书的对联一副。清代几十个状元写的对联,他几乎收全了,其中最后两个状元王寿彭、刘春霖的对联则系专为先生所书。吴佩孚、于佑任为先生写有中堂、对联,齐白石、吴昌硕等亦曾为先生作画。镶嵌于海藏庐楼内墙壁上的《张丹山公家传》三体(隶、行、楷)刻石,系由先生至交著名书法家赵铁山、柯璜、常旭春分别书丹(此刻石今已移置太原双塔寺)。尤令人惊羨的是,一把有阮元题诗的乾隆皇帝的檀香木折扇不知几经曲折,也从紫禁城归入海藏庐,供先生把玩。

海藏庐,即是图书庐,又是博物庐,名曰“海藏”,不虚也。

著述考略

关于先生的著述,《张箴传》仅记载:“他曾写《张公家传》……还著有《常旭春书丹》、《古稀城集》等书。当时的《民众日报》曾连载过他写的文章。”在此,除了所谓《民众日报》连载其文外,实际上仅仅指出了先生的一篇文章,即所谓《张公家传》(应为《张丹山公家传》——笔者),而《常旭春书丹》与《古稀城集》纯系误会,先生无此著作。

先生1959年逝世以后,先父与我曾先后拜访过先生之子山民世伯。他曾说,先生所遗诗文日记虽因故缺少和错乱了一些,然大体上还完好,由他妥善保存着。我想,山民伯临终前对此定会有妥善之处置。

先生一生勤于写作,著述甚多。从先父笔记中看出,他几乎每日有诗作,有时一日写作数首。他的七言古诗《古剑歌赠刘劝功》不满三小时即就,甚为刘氏惊讶。他的诗大气磅礴,不专在字句间推敲。他的文章,诚所谓既善为典雅之辞,又工为鄙俗之句。他仿汉人、六朝、唐人三种文体各撰就一篇《檐(阎)马(冯)叮铛国势将(蒋)亡赋》^④,皆为切体而精要之作。就以上提到的《张丹山公家传》等文,其理致气调俱臻高超,沛然之情从肺腑中流出,感人至深。先生之诗文集,已汇钞成数集,只是未加付印,流传的不多,我所见者仅是昔日山大文学院讲义中附印的极少篇章以及先父课堂笔记和诗文稿中抄录的一些而已。

我手头有依先生手迹石印之《海藏录》三本,共五集。此集子的次第是用十天干自配而编排的,即第一集为甲甲集,最后一集为癸癸集,全书共一百集。此书是对明清两代著作家的简明介绍,不管什么人,只要有著作,即为其立一小传,列其著作。每集以100人计,则全集应为万人,实为稀世罕见的一部明清著作家特大辞海。

1928年,先生还将散见于各处的清人孙嘉淦文章汇编成《兴县孙锡公先生文存》两卷,凡2册,由先生工楷誊真,加有书套,未加付印。

1946年,先生致先父函内有言:“我近来对于相识之人作古者拟各作一小传,按年编次,以志不忘。每百人为一卷。第一卷业已撰就誊真,第二卷尚未脱稿。”据此,又知先生曾有此人物传记之作,唯不知书名为何,共有几卷。

总之,先生著述是一个有待访查其下落,搜集、整理的事业。

“晚节常思保厥终”

先生为人严肃威重,性刚直,从不附会流俗,绝不苟合取容。他的亲家,也是他的朋友常子襄先生(山大

教授、书法家)于寓中自书“一团和气”四字屏一幅,竟引来他这样一首诗:“‘一团和气’说常家,雀鼠何由泯角牙?无奈世风逢叔季,况当我辈老年华!傅琳不审终何益,父子相夷计亦差。自劝自怜还自慰,莫教晚节混瑜瑕!”与先生相反,常先生为人和平乐易,此屏也正是他性格的写照,然在先生看来,值此衰乱之世,多事之秋,“一团和气”无论作为一种个人修养,或处世之道,难免遇事瑕瑜不分,是非不明,无益于晚节之保持。所以,他不欣赏“一团和气”,他一生严于自为,性格上又是心直口快,有话直说的人,每谈及不平之事,激昂慷慨,语有锋芒。他见不得虚伪做作,对那些摆官架子的人更是心存厌恶,曾撰门联曰:我原无半点私情何须害怕;君若有几分官气切莫进来。这样的性格,自然免不了刺伤一些人,与个别人失了和气。先生有诗云:“恨我独行遭白眼,抗怀往古落尘红。良师益友今何在?晚节常思保厥终。”为保晚节之终,先生不在乎区区恩怨得失,他仍旧惯,有话就直说,直写,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流污哪堪与合同,伤心三晋已成风”;“自省堂(太原市海子边省政府大礼堂——笔者注)中谁自省?同来海上逐一场”;“人情鬼域世豺虎,不忍从旁袖手观”……此类诗句举不胜举,足以见先生的诗品与人品了。

中原大战后,寄居大连的阎锡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消息传到太原后,先生愤而寄书于阎,“内有‘秦桧好当,秦桧的子孙难当’等指责阎出卖国家民族的痛切语句。”(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阎锡山回到山西后,先生再次上书,信一连用了五句“慎之慎之”,最后写道:“大海茫茫,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子子孙孙奴隶外人,籁诚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矣。”(辛未10月10号《上阎伯川先生书》)先生这种忧国忧民之心为全省人士所共知,先生这种直言无畏的气概为全省人士所钦仰。

“七·七”事变前,66岁的先生已辞职家居。日寇人侵太原时,他避居晋南解县(今运城市)一年,翌年

十月重返太原,深居海藏庐,闭户读书。“日本占领军想利用张籁在学术界的声望,拉拢他当维持会长,强行为他拍照‘标准像’时,他却紧闭双眼,以示抵制。”(《张籁传》)终于保持了晚节。如先生诗云:“我无新面目,尚可对山河。”(丙戌元宵后二日早)

1946年,邓子诚托人欲购先生所藏明末清初刊印的诗文集,当先生得知邓是为设在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购书时,“佛然曰:‘我的书不卖给外国人!’事遂罢。”(高之杜:《张贯三先生二三事》。载《山西文史资料》第59辑。)

古代多少藏书家为子孙后代订有许多严格的规约,如有的书本上印有“借书不孝”的字样,严禁子弟借书于外人。有的规定,自家人看书,也必须几房联合开锁入室。这些规约,自有藏书家的良苦用心,不可随便臧否,但总不免有不近人情之嫌;先生则反是,他虽嗜书如命,但不是那密藏而矜富的藏书家,而是公书于众,允人借阅。他临街的院墙上即刻有“贯三私立图书馆”几个大字,先生这种公天下之心而藏书的品格无疑更为可贵。先生关心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曾以重金为平陆县捐赠两千册之《四部备要》样本一部,供阖县父老子弟阅览,确是一桩文化扶贫的善举。

解放后,先生被聘为山西省政协常委、省人民政府顾问。从1949年太原解放到1959年先生病逝,其间不知有多少学者与文史工作者问教于先生之门,垂囊而入,荷戟而返,欣欣然如大海之得指南,先生可谓不遗余力矣。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其年近八旬的时候,得见新中国的诞生,目睹着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喜悦感慨,时有抒怀。1950年6月,他在出席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后,喜赋长律曰:

不才久却避贤肩 (丁丑解职已十有三年)

在后忽焉又在前 (沉沦忽辱邀前列幸甚)

革故鼎新文虎豹 (藏书蒙政府代为保存)

天空海阔我鱼鸢 (政策宽大老者安之)



刘劝功，山西平鲁县人、同盟会员，是贯三先生令德堂同学，后留学日本，搞过实业。图为张贯三(左)与刘劝功合影。

老来姜桂三年学 (性辣不变由于学久故)

秋到梧桐一叶祥 (本年自觉神形略短欠)

满座高朋齐拜首 (会议秩序情谊甚融洽)

修身以俟想同然 (同人想均赞成我立命)

先生归心于人民政府，“他将所收藏书中比较珍贵的线装书包括经史子集共 57000 余册酌资捐献给山西大学图书馆。他所藏的方志和金石部分现藏于省图书馆，其中方志系抗战期间让售，金石系逝世后捐献。”(《张籍传》)总之，先生的藏书和文物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这是先生之幸，也是人民之幸！

2000 年元月 22 日于恨少斋

(作者为忻州地区经委退休干部)

①薛笃弼(1892 - 1976)——山西解县(今运城市)人，著名法学家，曾任国民党内政部长、卫生部长、水利部长等职，向以清廉著称。解放后为全国政协第二、

三、四届委员、上海律师学会副主任，毛主席曾称赞他为“野有遗贤”。

②冯纶(1889 - 1954)——字次经，山西隰县人，著名法学家，曾留学日本。抗战前，冯任过山西大学校长、法学院院长。抗战期间，曾任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山大代理校长等职。解放后任山西省政府委员。有《刑法总论》、《民法总论》等著作。

③约在 1957 年前后，笔者从山西师范学院(即今之山西大学)院刊上得悉，先生已将影抄的弘治版《山西通志》慨赠该院。

④“檐马叮铛，国势将亡”——南宋理宗时一童谣。“檐马”是指寺庙屋角上的铁马，有风则摆动发声。宋理宗时奸臣丁大全、马天骥二人并在阎贵妃左右为乱，故有如上之童谣，“檐”寓阎贵妃，“马”寓马天骥，“叮”寓丁大全。张贯三先生以此童谣作赋，“檐”寓阎锡山，“马”寓冯玉祥，“将”寓蒋介石。

李 先 念 主 席

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各位同志：

这次全国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将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研究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并规划当前的工作。

刚刚经历过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斗争，留给我们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小平同志曾经讲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包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革命传统的教育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的教育等。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用历史事实进行教

育，让人民群众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三十年来，文史部门征集和出版了数以亿字的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提供了历史的

借鉴。许多朋友和同志，许多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孜孜不倦地撰写出大量的史料，又通过你们的辛勤劳动编印成精神产品，广为发行和传播，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光荣的。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会议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

李 先 念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

平陸文史資料

活 页 版

平陆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1990年6月15日

第21期

苦守中条山的赵将军

金在熔

敌人进攻中条山有十一次了，每一次都遭到惨痛的失败。这完全是我们坚守在中条山里几十万大军的光荣功绩。赵寿山将军便是这些使敌人闻声胆寒的辉煌人物中的一个。

在北战场当中，负有极大声威曾被蒋委员长誉为“抗战第一功”卫立煌将军，他在几次中条的恶战之后，送给赵寿山军长一个

称号，称他作“中条山的铁柱子”。这个称号对于赵寿山军长是非常贴切的。他那高大的身材，雄伟的体格，站起来就象一根柱子一座塔一样。两年来他率领着兄弟们，坚守在中条山，击退了敌人一次复一次的进犯，就好比是一根铁柱子撑持着中条山，把我们的阵地守卫得越加坚牢而不可侵犯了。

这位长于征战的将军，态度诚恳忠厚，眼睛里永远流露着和善可亲的光彩，对部下对朋友都是如此；他常用一个慈祥长者的态度去教导部下，谆谆不倦的给部下以严正的指示。一直到现在他仍不间断的做着他的早晚两课，打太极拳和记日记。他说这课程给了他很大的益处，他的日记使他能检讨一切，发现错误，订出许多革新的计划和实行的辨法。他在生活上完全与士兵共甘苦，吃一样的青菜馒头，穿灰棉布军衣，每天办公的时间常是超过十个钟头以上；在战事紧急的时候，可以整夜不入睡，只偶或坐在马上打打盹就行。这当是他身体的健壮。

他每天唯一的消遣是和参谋长下围棋。

主将规律的生活，在全军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模范作用。以军部到连部，无论

官兵，生活相同，官兵一体。军长提出三大禁令，（禁嫖、禁吸、禁赌），四大口号（官兵一致，军民合作，人事公开，经济公开）他自己首先极其严格地执行着。这些口号和禁令，便是军中一种革新运动的基本原则。而被全体的官兵确实不苟的践行着，真正做到了一致，一个军队象一个人一样，因此，部队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战斗力也就更加强了！

赵寿山将军是具有很大毅力与决心的，当抗日战争初起，他就率部转战于河北大平原上，在初期抗战中敌人占很大优势。于是，在几次大战役中就受了不小的损失，赵军长接受了这些实际的经验与教训，便在礮口整训期间设立干部训练班，在匆促的月余工夫里，将全军的干部抽调受训，从这里打下了部队革新的基础。

直到现在，赵军长始终未敢忽视部队的教育工作，军中从军司令部到连部，每周都要按时开小组讨论会，对于生活上，学习上，战术上各种问题，都要在小组中讨论研究，连长以下的干部，必须参加士兵小组，在生活检讨会上，要举行自我批评，互相抗评。我曾参加一个班的小组会，一个士兵发言，说近来的伙食不好，要

连部的特务长加以改良。另外还有一个人说，构筑工事的时候，本该他轮班休息了，营长却斥他偷懒怠惰。他指出营长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当汪逆精卫投降敌人和以后宪政问题被提出的时候，在他们的小组会上都曾展开了很认真的讨论。

本年四月间，赵军长号召扫除军中文盲运动，限定到六月底每个士兵最少要能识字一百八十个，干部最少要能会写一封信。为了鼓励士兵识字的兴趣，军长自己拿出钱来买了信封信纸和邮票，发给每一个士兵，让他们各寄一封平安的书信回家。在每一个连队上，都设有识字沙盘，并且在随时随地的机会都要识字。伙夫下山挑水了，他就要记住这一个“水”字，担任警戒的卫兵在交替的时候，要能把警戒的任务及“警戒”这两个字一齐交代出来。

在军部办公室出了一个刊物，叫作“新军人”，每半月发刊一次，每期印三百多份。都是靠了一架抄写公文的油印机腾出的空间和一个总办编辑抄写印刷的人来完成的，每一个连上都可以得到一份来轮流传阅。在这个刊物上常常反映着全军的生活和革新部队加紧教育的问题。差不多每期都刊有赵军长的文章，他常常细心写

出革新部队的意见送到这刊物上发表。他希望整个军队都能以过去的旧式军沿着这一条慢慢过渡到崭新的阶段。他把（新军人）看作带动部队革新运动的火车头。

在连队上，都出刊一份或几份的小型壁报，投稿，编辑，抄写，完全由士兵负责。这是更能真切反映士兵生活的东西。士兵都将其视为己有，所以都很热心的去做这一份工作。在某团的两个连上，出刊建军周刊，生活刊两种壁报，他们除自己阅读这外，还手抄三十余份，分送全团各连队，敌人的大炮把山上的庙宇打坏了，我们的士兵就用碎落下来的石灰，和成石灰水去粉刷他们的壁报栏和大字的标语。

看报成了军中必不可少的习惯，军长每天要读报纸，在四五月间章乃器先生有一篇论文在大公报发表，题目是“团结之道御侮之道”赵军长就把这篇文章剪下来放在案头，让大家阅读。

各营部连部，都订有五六份报纸，士兵们热心的注意着世界各处和抗战中国的大小事情。识字多的人把新闻念给不识字的，遇到重要的问题即开会讨论，你如果用报纸包着东西到前线上去，便有武装的弟兄跑过

来，向你敬礼，讨那张报纸去看，赵军长见了人，先问你几号的报纸看了没有，某篇文章见了没有，把这作为见面的寒暄了。

还有一件事情足以证明赵军长身体力行为人模范的责任心。卫立煌将军发明了一种木质的活动堡垒，在山地的守卫战中，这种活动堡垒是有很多好处的，赵军长在他军部门口亲自做成了一个，让来谒见他的干部都仔细看看做法，不久之后，利用了拆除庙宇的木材，中条山里峰岭间到处都隐藏着这坚固的堡垒座了。

为了彻底推行部队的革新计划，他着手组织了一个督察团，每月出发全军巡视一次，第一次出巡的结果，撤换了二十几个不称职的官佐，集合了下级官兵的意见，作成了极宝贵的报告书，每次出巡结果都使部队往前更进一步，赵寿山将军于赴重庆面谒蒋委员长聆训归来，就沿着绵长的火线巡视一周，亲自看看士兵们的生活如何，就象一个长者去探望久别的子弟一样。

“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赵军长是十分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士兵的政治教育，军队和民众的合作都视为战斗的基本条件，四月间他提出了挖掘一百窑洞，组训十万民众的号召，

赵善卿同志传略

赵善卿同志一九一六年生于山西省平陆县，一九三七年十月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历任自卫队大队长、连长、大队特派员、团特派员、旅保卫科长、团政委。建国后，历任师干部部副部长、地委副书记、书记、保山边防军分区政委，云南省委边委副书记、云南省农业局革委会主任、云南省农办副主任、云南省计委副主任，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一九八〇年离休。

在抗日战争中，赵善卿同志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军原则和军事思想，立场坚定，艰苦奋斗，团结干部、战士，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依靠广大群众，

在敌后游击区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参加过几十次战斗，曾负重伤，伤愈后继续坚持战斗，为发展和巩固太岳解放区作出了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赵善卿同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努力工作，英勇战斗，在南渡黄河挺进中原作战中立过大功，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中荣获纵队模范工作者称号，在渡江战役中荣立大功，进军云南后在剿匪征粮中再立大功。赵善卿同志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为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战功，作出了贡献。

建国以来，赵善卿同志到地方工作，一贯注意把党的方针政策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民众都自动出来帮助军队挖窑洞，到夜间军队主持的民众夜校和流动小学都开课了，老人和孩子坐在学校里，拿了军队买给他的课本认识一个一个新字，了解着新的事情。

赵军长为了怕军队住在百姓家里骚扰民众，就发起了打窑洞的号召，在中条山里老百姓没有粮食了，敌人把山口封锁了，赵军长就派人去山外购粮，以救济粮

荒，他爱民众一如爱护自己的军队。

在敌人第十一次进攻中条山失败的时候，田野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为了防止敌人抢割和放火烧山，赵军长命令他的军队着了全副武装在田地里帮助民众收割，准备遇有敌人进夜，即行迎击。山岭上民众也在帮助士兵加紧工事巩固阵地，山上山下，已熟的麦子闪烁着金黄的光波，士兵为地里散在

麦田里，辛勤的工作着，赵寿山将军，他站在山头上，山野里到处飘扬着洪亮的歌声。我们中条山的铁柱子呀！

……

我们×××军健儿坚似铁，中条山、黄河岸，比铁还要坚！

摘自《中华民国三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扫荡版》战地栏第七十五期》

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他主持保山地委工作期间，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使保山地区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成为全省经济繁荣的最好地区之一，并持续向前发展。省委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在保山召开了现场会，推广了他们的先进经验。

十年内乱中，赵善卿同志曾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他仍坚定地相信党，坚持原则，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疑。粉碎“四人帮”以来，赵善卿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参加云南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决策的研究与讨论，对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宏伟目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一九八〇年，为了保证新老干部交替的顺利进行，赵善卿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提出并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他离休以来，继续关心党和人民的事业，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满腔热忱地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曾多次以座谈或书面等形式向省计委、

省人大和省委提出对发展云南省农业的建议和设想；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积极参加干休所的集体活动，关心干休所的建设；言传身教地严格管教自己的子女。他鞠躬尽瘁，表现了一位老党员、老干部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赵善卿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理想，把一生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意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一贯兢兢业业，积极负责，任劳任怨；他识大体、顾大局，坚持党的原则，自觉服从党的组织纪律；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个人恩怨；他作风正派，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团结同志。

赵善卿同志因脑溢血抢救无效，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在昆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赵两喜 整理）



黄埔军校平陆籍学员名录

黄埔军校

平陆籍学员名录

我在编修新县志过程中，陆续收集到二十三名平陆籍黄埔军校或分校学员的零碎资料。从这些资料看，平陆籍黄埔生，自三期始，以四期人数为最多，六期次之，七期以后还有十一人相继入校结业。由于时光的流逝，这些人今所尚存者已是十有二、三，现将其整理出来，望知情者阅后给予指正和补充。

第三至六期

范宏亮（1887—1979）

字子明，常乐范滩人，1924年在太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奉组织令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三期步科学员。毕业后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任朱德警卫营长，后转做地下工作。1928年在北平被捕，1931年出狱与党失去联系。此后混迹国民党军队十多年，曾任过副团长、旅

长、副师长、师长，厦门警备司令、福州警备司令和台湾基隆要塞司令。1948年4月，在山东六营集随七十军起义。之后奉周恩来面谕专做策反工作，相继促成国民党第三十九军、二十六军和第八军起义，特别是与卢汉、龙云等云南军政要人谈判成功，使云南宣告和平解放。1956年3月，调往昆明市治安大队长，恪守职责，破获敌特，敌台及反动会道门甚众。1955年改任市北京饭店经理，为时达二十一年之久，1966年后一直是市政协常委、市人大代表。

陈三俊，常乐圪塔村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学员。

张希涛，县东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一团一连学员。据说曾任过孙中山的卫队长。1931年由中共南京市委筹委负责人张稼夫介绍入党，之后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搜集到国民党军用地图和对我苏区的围剿计划等重要军事机密。1933年下半年不幸被捕，1936年无业住南京山西会馆。再后情

况不详。

杨长河，城关南坡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一团七连学员。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死于河南许昌一带。

王聚才，城关茅津村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一团七连学员。抗战中期在第一战区汤恩伯部某师任团长，其后调某新编旅任副旅长。解放战争初期，率部驻平汉路南段安阳一带，战败，被我人民解放军俘虏。

任成久，又名任宗功，城关茅津村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一团八连学员。

裴建唐，和任成久为同连学员。

荆向荣，又名荆新生，洪池人，系黄埔军校第四期经理科大队一队学员。1936年任南京参谋本部少校科长，抗战中期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上校处长，后曾一度任陕西省华阳县县长，全国解放前夕出走台湾。

郝广胜（1900—1927），曹川崖人，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学员。